



浩气长流

——王康访谈 ● 王春霞

王康小传

生于中国现代历史最大变局的年头：1949年。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特别的理想主义者。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，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、学院翰林之外。耽于沉思，疏于著述，不求闻达，不意被封“民间思想家”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“中国改革宪章”，名动京畿；九十年代初再以《大道》为题，撰写叩问“中国往何处去”之五集政论片，论者称为“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”。同期有长篇诗评《俄罗斯启示》传布四方。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《抗战陪都》倾服众多业内人士；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《浩气长流》，一朝问世，震动四方。对中美关系、台湾悬案、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、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，自谓“人世”未尽解，而“天命”已略知。（来源：凤凰卫视）

一不小心，俨然成了中日问题专家

学习博览：我们知道，您是抗战研究专家；也知道，您早先并不是学习历史的。那么，您怎么开始关注抗战了呢？

王康：我以前不太了解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。

1995年某天，我通宵看完《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》，一下就悟到：中国的抗战，肯定是中国国民党领导而且实际进行的一场国家战争行为。第二天，我约了该书主编，说要根据此书拍一部电视片，他眼睛都睁大了，根本不敢想象能拍这样的电视片。

再一天，我开始集资。卢作孚的孙子卢铿，深怀

文化理想的房地产商，和另一家企业投入了80万，没有任何回报，协议极简约——我在本地的人品口碑还可以。

结果拍了9集专题片《抗战陪都》，最初给毙了。广电部主任说这个专题片毙掉可惜，请了一些专家学者提意见，通知我们按照要求做修改，最终得以播放，引起相当的关注。现在回看，当属1949年后第一部为国民党、蒋介石寻求公道的电视作品。采访近百位“陪都”人士，搜集大量史料，坚持在1989年以后继续思考与议论“国是”。

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接触抗战。

2002年，我跟中央电视台合拍了5集专题片《重庆大轰炸》。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是中国抗战最重大的战略决策。重庆大轰炸是人类战争史上“无差别轰炸”的开端，是日本侵华战争最重大的事件之一，对于中国抗战和东方战场关系极深，只因1949年后党派恩怨和意识形态偏见被尘封近一个甲子。

这样，我进一步“内在”了解了抗日战争的真相和本质。

2004年后，跟凤凰卫视连续合作，把台湾蒋纬国任总顾问的《一寸河山一寸血》（48集）改编成了10集专题片《山河岁月》，内容包括花园口决堤、南京大屠杀、长沙大火、细菌战、慰安妇、文化战线、教育搬迁、工厂西迁等等。因反响强烈，又利用边角材料编辑出10集《喋血会战》，包括淞沪、徐州、武汉、随枣、长沙、豫湘桂等会战以及中国远征军。这是国民党为抗战拍摄的一部大型纪录片，难免有偏见和悲情，但远比大陆同类电视作品真实、客观，具有国家意识和历史感。

我因此对抗战有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。

我自认为在抗战方面与体制内的专家不同，不仅因为我没有任何头衔，还在于我生性厌恶世俗功名，并且对世界史和中国史有贯通的眼光，对中国近代宿命有独特的体认。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早早是我高度认同的历史与人生追求。

学习博览：听说您与众画家制作了一幅800米长卷，具体怎么回事？

王康：200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，我们组织了四五十位画家、评论家和学者，制作了一幅巨型国画，总名《浩气长流》。总长超过800米，据行家说，在中国美术史上不曾有过。但我认为不在规模巨大，而在内容空前。我们第一次以艺术形式再现抗战大局，士农工商、全民抗战。为尊重历史，我们大量运用了现代“构成”技术，把各种历史元素融入人物造型和史诗叙事，单文字（包括序、传、述、跋、标语、口号、歌曲、誓词、宣言、语录、祭文……）就达20余万，全部采用正体字。我们秉持超党派、超政治的自由、独立的民间立场，深信这才符合民族大义与历史正道。

工作量极其繁重，大量的策划、组织工作，各种矛盾、冲突、分歧，不同的看法，吃喝拉撒，纸张笔墨……我自然是“磨心”，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，365天如此，最后累倒，上吐下泻，卧床不起。积劳成疾，到现在都没缓过来。

于是，我对中日战争、中日关系又获得了一个飞跃的了解。

后来偶尔也出去做作报告，毕竟有这么多素材和资料，我记性好，过目不忘，演讲并不特别费力。这样一不小心，俨然成了抗日战争的民间学者。

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宿命

学习博览：对于中日关系您有什么样的看法？

王康：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宿命。

日本本来是中国的学生，“明治”以后，成了中国的老师。“甲午”后变成中国不共戴天的仇人，这个过程很复杂。一直到现在，日本对中国恶性的影响也永远没有过去，尤其是抗战的影响。

关键字：浩气长流

2005年，800米长、2米多高的抗战史诗国画《浩气长流》在重庆完成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为画卷亲笔题名。画中有名有姓人物1008位，几乎涵盖了从中国从1931年到1945年十四年抗战所有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。

画卷由《故国》、《山河岁月》、《血肉长城》、《精神堡垒》、《信义和平》和《祈祷》六部分组成。总策划王康，江碧波任艺术总监，马一丹、欧治渝、张春新、李犁分别担任领衔画家。

创作耗费了大量纸张笔墨，仅宣纸就用了3000多张，重庆市面上八尺宣纸被买空，只有多次去安徽订购。

五六个装裱师傅专程从河南赶来，带来一台西南地区没有的大型装裱机。因装裱机太大，只得启用吊车。

从 19 世纪末甲午战争到 1937 年，“洋务运动”，“戊戌变法”，“辛亥革命”，“北伐东征”……中国近现代的几番努力都被日本打断了。如果没有日本的入侵，中国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化可能早已完成。

抗战本来给中国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，中华民族的精神得到了新生，林语堂所说“在血污与废墟中，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”。

当时，中国的国家制度已经具有真正的现代性。比如战时教育，国民政府下了很大力量，召开过三次全国性教育大会，坚持教育以社会独立办理为主，八年下来，中国战时教育成就之大，世所瞩目。中国现代学术、思想、文化、教育、艺术得到长足和奠基的发展，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李远哲等人，就是抗战教育的受惠者。

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有一批真正的精英。连胡适这种大学问家，对国民党向来持批判立场的人，也在国难当头做了一个“过河卒子”，直接受命到美国去做全权大使。危难时期，世界各地的学子回国报效，没有国家政府的开放、开明和现代化安排，这些受西方影响的学子不可能回来。

中国的抗战是辛亥革命之后，中国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在国难当头的时候，以极高的代价，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结合。

中国的抗战不仅仅为一个民族。1937 年 7 月 8 日国民政府发布的“抗战自卫声明”，1941 年 12 月 8 日国府主席林森发布的对德意日的“宣战声明”，1945 年 8 月 15 日蒋介石发布的“告中国全国同胞书”，都一再强调，中国的抗战不仅仅是为中国自己，也是为人类的公理和和平而战，绝不是虚言。

如果没有中国，二战本质上还是一战的延续，还是旧式的列强争夺、瓜分世界的战争。因为中国的介入，这次战争被赋予了鲜明的侵略和被侵略、文明与野蛮、光明与黑暗、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之别。

现在研究抗日战争，对中国的再统一、将来的复兴有特殊意义。只有抗战，中国的固有精神，中国的现代意识，整个民族的认同才得以保存和再生，才是刚正、健康和伟大的。既捍卫自己，保卫家园，又保

关键字：家庭

王康父亲曾在四川大学物理学读书，因爱情转入化学系，天性超脱，习自然科学，对中国式的政治了无兴趣。1950 年，王康的父亲被捕，1957 年出狱。1982 年，父亲在重庆滩子口木材加工厂“退休”后，其工龄仅有四年，问题也得以“改正”。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。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，可能是弄错了。王康回忆说，他父亲在临终前，“慢慢抓住我的手说，生为一个中国人，实在太惨。”

王康的母亲研习化学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她注定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中学化学教师，“像所有中国女性一样，作为女儿、妹妹、姐姐、妻子、母亲、祖母和曾祖母以及姨妈、舅妈、儿媳、弟媳、岳母……，母亲在中国发明的所有加诸女性的角色中，都拼命地尽她的心，她的力，她的道。”有着极好国学修养的王母在悲苦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。

这样的家庭给予了王康足够的启示。在父母相隔不到半年先后谢世之后，王康感慨说：性灵中国、悲情中国、道义中国正在解体，中国老一代知识人正在彻底离开。对这个时代，他们两手干净，两眼清明，灵魂高洁。（余世存《王康其人》）

卫人类的和平。这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强、而且是中国人天下主义一次悲壮而辉煌的实践。

苏联甩给的意识形态包袱

学习博览：抗战胜利之后，应该说苏联和俄罗斯对我们的影响更大吧？

王康：抗战之后，中国抛弃英美，转向苏联，这是历史的惨痛倒退和深重迷雾，中国本来很刚正很泼辣的民族精神和世界主义被取代。苏联的道路走到了死胡同，人家自己都终结了，我们还守着，这是当代中国最沉重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包袱。

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，比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更大。日本是显性的侵略，把它打败，日本的因素就基本消解了。俄国不一样，苏俄那套国家制度设计，对中国的影响太大太大了，超过了任何的国家。20 世纪以来，日本力图在领土上征服中国，而俄国却在精神上征服了中国。

俄国对中国的影响更大，这是荒唐透顶的。

俄国“十月革命”，以前说它开辟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，结束了西方三百年一统天下的局面，打破了资本主义所谓最薄弱的链条，然后成为全世界被迫民族的解放道路。现在看，简直是弥天大谎。

“十月革命”实际上是植根在俄国的地理与历史传统当中的一场政变,或者叫武装哗变,也可以叫政权革命。历史已经证明,它绝对不拥有普遍有效的真理性,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。马克思、恩格斯一直对俄国革命抱着强烈质疑的态度。他们犹犹豫豫地说,俄国革命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一个导火索,但是得取决于西欧革命的全面爆发。如果没有欧洲革命,那么俄国革命、尤其是把土地收归国有的那种革命,很可能导致亚细亚式东方专制主义的复辟。

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忧虑不仅有深刻的理性,而且得到事实证明,是对的。只是他们没有、也不可能预见到,这种“复辟”将呈现出多么难以想象的荒谬和悲剧图景。

总而言之,苏联“十月革命”对中国的影响,实际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骗局,前所未有的宿命。它在某些方面可能适合了中国当时的某些需要,却绝对不会适合中国几千年的文明、历史和民族特性,更不代表中国的未来。中国和俄国相差太远了。

一直到现在,应该说日本的影响大体上解除了,但是苏联的影响还在。俄国的遗产居然穿越时空,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继承下来,直到现在。

跨越制度性的海峡

学习博览:这次汶川地震大灾难中,我们看到中国民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凝聚起来了,而且在这这么同心协力的时候,还是有人在质疑、在反思。这会不会成为我们民族在精神上自立起来的一种契机呢?

王康:不排除这可能性。



但是,因为才发生了“家乐福现象”,更大的可能性是被专制主义引导到中国的民族主义上来,这种民族主义仍然是反现代普世价值的。它最后形成的局面和结果,仍然是国家至上,主权绝对,具体表现为党的伟大、人民解放军的伟大,总之是制度崇拜。

批判主义的、质疑的,或者其他新的力量还很微弱。

对于中国的重建,尤其国家基本制度和精神文明的重建,台湾的存在,以及和平统一的前景,是最有力量、最可期待、最应得到关注的一种可能性。

大陆内部能不能变化?有一种可能性,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但是两岸的关系一旦走出去,至少不会太坏,至少避免了两岸一战。两岸有了一种真实的互动,哪怕仍然是对手的关系,只要最终的目标锁定在和平统一,中国就有戏。

也不能说中国不谈统一就绝对没有戏,但是我看不见这个“戏”在哪里。

共产党就不搞政治体制改革,老百姓也没这个要求,活得过去就行了。几个自由派、几个知识分子在那说来说去,几乎等于自说自话。当然也不是完全没用,比如关于民生、社会问题、环保、生态、腐败,自发的 NGO,这些声音也有用。但是当局并不反对这些,他们也一直在做。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根本哲学与基本制度上,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人类共同的负担。

台湾海峡是一个制度性的海峡。就像欧洲从中世纪的专制王权走到了现代宪政道路一样,台湾也成功地经历了从传统威权社会到自由民主时代的曲折过程。

学习博览: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,如果能容忍多元、容忍异端,那么在香港和台湾的问题上该如何体现呢?

王康:中国统一很可能总结中国先秦以来地方自治的教训,采纳西方联邦制,而绝不再重蹈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单一制。多种宗教、多个民族的国家,最好的方式是实行联邦制。中国有实行联邦制的天然土壤。

孔子和耶稣可以握手

学习博览:我觉得在中国追求自由、追求民主的人不是特别多,您

认可这个判断吗？

王康：尤其是始终追求自由民主的就更不多了。

学习博览：那么，在这种不太向往自由跟民主的环境下，您为什么一直这么坚持？

王康：我不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范围，我没给自己归类。我深怀中国情结，就像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情结一样。只有自由民主才让中国人有尊严，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富强和高尚，这已是常识。但是自由和民主对于中国更是一种中介，一个过程，而不是全部终极价值所在。

我还是觉得孔子那些教诲更亲切更深刻，与生俱来的那种内在的安身立命、做人行事的基础，更适合中国人的天性，也更适合这个被各种激进思想和极端行为折腾不已的世界。很简单，西方高度发达、高度文明，但确实危机不浅。就其正面价值而言，它需要经过很多环节，很多层次，才能达到。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肯定不存在根本价值的对抗关系。中国现行制度只是一种历史现象，我们要超越它。一旦上升到大的历史尺度和全球视野，我们就不难发现，一种真正的“天命”从来没有离开中国。

孔子和耶稣是完全可以握手的。

自由民主的概念和术语来自西方，这毫无疑问；但是儒家的真精神，道家的大智慧也充满自由、独立。自由更多靠个人精神上天赋，随时可以发挥流布，不喜欢专制，就隐居、流浪，而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共生产物，不过其根本精神还是来自自由和独立。

“独立”和“自由”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传统，很宝贵的资源，即使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过程里，中国文化所倚重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识仍然是须臾不可离的。与西方的自由在形态上不完全一样，但本质上都

关键字：文学社

（我记得）中文系 78 级“普通人文社”的成立，我印象深刻的是成立大会上张鲁、王康、姜立挺等几位学长的言论。王康自是宏论滔滔，张鲁更是口若悬河。记得张鲁说道：再也不能如过去那样，甚至连别人吐在脸上的唾沫也只能阴干。我们要把高高在上的人拉下来，把跪在地下的人托起来……那时候，全场一片掌声。（川江）

一样，都强调个体生命的至高无上，个体精神的不可替代。就自由和独立而言，中国完全可以欣赏，接受并有效地实行民主、宪政、法制等现代文明。西方和东方完全可以互相对话、互相补充。所谓的“国情”差异，制度不同，不过都是权势自造的妄言，不足为凭。

学习博览：您年轻的时候，比如在大学创办文学社的时候，是什么想法？

王康：我上大学都 29 岁了，经历了文革、农村、回城、工作到考大学，对中国的认识已经大体完成。当时很多书，如《历史的审判》、《新阶级》我们都看过，并且本能地与中国作比较。大学四年，我一共上了不到两个月的课，绝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。1981 年，县级以下“人民代表”选举，我和几十个同学成立了“普通人文社”。

我们是中国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的一代，也是中国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一代，我们还是一种全所未有的历史垂顾中，我们个人的命运与世界上最大生命共同体的命运难分难解，在此意义上，我们是最特殊也最幸运的一代。♥

采访侧记

采访王康，是在望京西园 607。下午两点，他刚写完一篇很长的文章，近万字一气呵成，而且手写，他有些累了。他淡淡地说，思维还停留在那篇文章里，接下来可能说得不太好，也许需要我们扯回来。

旁边有人说他还没吃饭，我们连忙劝他先吃完饭再谈话。听说，他有点低血糖。谈话开始不久，一碗热腾腾的面上桌，王康端在手上，用筷子搅来拌去，我们催了他几次，都没能打断他，让他吃上一口。大概谈了多半个小时，他才粗粗将面吃下。

我拿着相机，试图抓拍几张“列宁像”。早听说，他的模样像极列宁，当面看来，果然：光亮的脑门，挺直的鼻梁，浓黑的眉毛，略翘的下巴，络腮胡子，还有纯净而凛然的眼神。他身上有种自在、自足的散淡气息。浅黄色 T 恤里外穿反了，上面油渍斑斑。或许对他来说，所有的外在都不重要。

那天，是哀悼日，两点 28 分，房间里所有的人站立，面朝西南，默哀。

第一次见王康，访王康，在这个日子，永世难忘。